

地方教會歷史研究： 對教會未來發展的重大影響

Arnulf Camps 著

林瑞琪譯



作者與巴西聖保羅教區 ARNS 樞機合照

過去數十年間，教會歷史研究工作經歷了不少轉變。新的視野和新的方法更新了歷史研究的傳統方向。教會史不再只是歷史家

用來了解過去的學問。今天，很多其他探討人類前景的學科，都對教會歷史抱有興趣，因為很多學者都意識到，教會對整個人類文

化發展的影響，且在未來，這份影響力將繼續存在。現代歷史學家都在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思想脈絡中來探討教會的歷史。本文將探討教會史學復興下的新趨勢，並指出治史方法上的重要改變，以及這個正在革新中的傳統學科的新幅度。

方法學的轉變

教會歷史學研究現正面臨兩大轉變。首先是對傳統資料的處理態度；其次是對口傳歷史的引入。

傳統資料包括檔案室的原始文件及在圖書館內借閱得到的出版物。通常使用這些資料的人，都是些西方學者，他們主要是想研究西方基督宗教如何透過西方機構及個別人士向外傳揚。他們所寫的傳教歷史，通常都預先有了西方人士的觀點，主要是談西方人士的貢獻及成就，諸如有多少人歸依，建築了多少聖堂，解決了多少難題，有多少殉道者及英雄人物等等。至於當地人如何接受基督宗教的問題，則甚少注意到。

亞非拉各大洲的人民如何接受基督宗教的歷史，雖然尚待日後撰寫。但時至今日，有賴各大洲的歷史學家的努力，從受方角度編寫歷史已逐漸成為主流。

《印度基督宗教史》正是一個好例子。全書共分兩卷，八十年代初期在印度班加羅市出版；卷一由A.M. Mundadan 撰寫，談論在印度的基督宗教源起，以至一五四二年為止的歷史；卷二則論述十六世紀中期至十七世紀末期的歷史問題，由 J. Thekkedath 撰寫。此外，尚有其他四卷正在籌劃中。這一系列歷史著作，視印度基督宗教歷史為印度人的社會文化歷史的一部份。印度基督宗教

史的重點是在印度的基督徒，探討他們是誰，他們如何了解自己，如何處理社會、宗教、文化及政治方面的衝擊，以及由於基督福音的傳入而引起的各種改變。兩位作者都沒有離開整個印度文化的背景來治史，他們都視印度基督徒為整個印度社會的一份子。

拉丁美洲教會史研究委員會亦有推動類似的計劃。自從一九七三年起，委員會主辦了一系列的研討會，探討拉丁美洲教會歷史上的種種問題。此外，並計劃了一系列十大冊的叢書，其中七冊經已出版，主要以西班牙文撰寫，也輔以英語及葡萄牙文。除總論之外，已完成的包括一冊專論巴西，一冊談墨西哥，一冊談中美洲，一冊談哥倫比亞及委內瑞拉，秘魯、厄瓜多爾及玻利維亞合佔一冊，另有一冊專門談一五二三年以來的美國國內拉美人士的教會。這些都是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七年間的工作，即將出版的有一冊加勒比海各國，一冊阿根廷，一冊智利、烏拉圭及巴拉圭，而巴西教會的最後一部份亦即將面世。委員會是一個十分活躍的組織，出版了很多其他的有關研究。委員會很多工作都由天主教及基督教攜手進行。這次拉丁美洲教會史重寫的重點是：從窮人的角度看歷史；從信仰耶穌基督者的角度去看歷史；這是合一的歷史，強調牧民意義及正確對待男女兩性在教會中角色的歷史。

第三世界神學家合一協會自一九八一年新德里會議開始，決定以受壓迫者的角度重寫教會的歷史。自一九八一年起，他們成立了國際協商小組以及全國性或區域性的研習會。這亦是在治史方法上產生重要改革的例子之一。

在治史方法上的另一個重大改變，就是

以口傳資料補充傳統資料的不足。在文化人類學方面，傳說及神話等口傳資料早已為人所重視；但在通史方面，口傳資料的使用，仍是很晚近的事情，主要是對當事人作錄音訪問。

至於本地教會史研究方面，荷蘭先自採用了這一方法。一九七六年一群Nijmegen天主教大學的學者，聯同一些傳教機關，進行一項名為「傳教工作回憶錄委員會」(KMM)的計劃。截至今年為止，經已進行了約一千次訪問，且工作仍在繼續進行中。這些不斷增加的資料，可供撰寫博士論文之用。下列文章可以引為例子，J. Cornelissen的《傳教士與巴布亞人》(Kampen 1988年版)，探討聖心會傳教士對印尼亞利安爪哇人的態度；J. Breetvelt的《兩極的結合》(Kampen 1989年版)，研究非洲醫院中本籍院長與西方醫生之間出現的問題；A. de Jong的《荷蘭傳教士在東非的服務》，討論荷蘭籍傳教士大量集結在東非，對當地國家的建立及本地教會的建設所產生的影響。

很多其他博士論文亦在預備中。我們也可以說，口傳歷史已成為了Nijmegen大學的一部份傳統。一九八八年，一個名為CREDIC專門研究教會歷史中之傳教事業的法國組織，在Nijmegen舉行了週年聚會，計劃進行國際間的合作。Nijmegen與國際傳教學研究協會也有接觸。這種新方法有多方面的優點，最主要的一點是，有關的主角（包括傳教士及當地人）有機會去全面反省他們的過往，並幫助歷史學家對所探討的事件達致一個更具人性及有更深入內心的反省。

值得一提的是 Jean-Paul Wiest的《瑪利諾會在中國：1918至1955》，同樣使用了

口傳歷史的方法。他曾訪問了兩百多位傳教士，及五十六位中國籍神父、修女、教友。他們大都在一九五二年以前，曾為瑪利諾會工作，或在瑪利諾會辦的學校和修院受訓。Geurdina Verstaelen - Gilhuis 也用了這個方法。她的論文《從荷蘭人傳教的教會到改革後的桑比亞教會》(Franeker 1982年版)，訪問了更多當地人，並用上數頁紙專門探討文字資料與口傳資料的關係。可以預見將來在撰寫教會歷史的過程中，口傳資料將佔重要的地位。這種方法毫無疑問將對當代教會產生極大的影響力，也使我們更能清楚了解當時傳教士的真正動機，洞悉當地人接受信仰的內心意義，因此，有助於教會檢討傳教事業，作出更正確的判斷，更加小心及更有信心地踏上未來的征途。

教會歷史的新方向

談過方法學上的改變後，我們不妨討論三個研究教會史新方向。首先是傳教會對本身歷史的突然間感到興趣；其次是通史學者重新認識到教會歷史的重要性，最後是傳教工作動機的轉變。

以往所用方法不斷受到批評，加之往日的傳教區政治形勢的轉變，西方傳教士人數遞減，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國家驅逐傳教士出境，曾使修道人士對他們過往在世界各地工作的價值，產生悲觀的想法，也質疑為他們撰寫歷史的意義。不過，今天處理的手法出現了鉅大的變化。剛才提到的《瑪利諾會與中國》一書，正是克服這種悲觀心態的成功例子。另一個例子是A.J. Austin的《拯救中國：一八八八年至一九五九年加拿大傳教士在中國》(Toronto - Buffalo -

London 1986 年版)。巴黎外方傳教會出版了兩部有關該會歷史的著作，一部關於朝鮮，名為《朝鮮之光》(巴黎1987年版)；另一部關於越南，名為《越南的殉道者及聖人》(巴黎1988年版)。拉丁美洲的國家，出版了很多這方面的研究，包括F. Mires的《拉丁美洲的殖民主義、傳教及侵略》(San Jose 1987年版)。前文所提及的 Geurdina Verstaelen - Gilhuis有關贊比亞的作品，可以反映出非洲教會對其本身歷史的關注。這些書籍，只是眾多例子當中的一二而已。

我們知道耶穌會、方濟各會、道明會等等，都曾把檔案室舊資料出版。Documenta Indica, the Sinica Franciscana, 以及偉大的拉丁美洲傳教士Bartolome de Las Casas的著作已是家傳戶曉。不過，今日我們對這些舊日的資料有了新的取向，我們不再只是出版檔案資料，而是對過往的文字資料作歷史學的研究，以檢討過去，並為傳教會、修會及學術機關與本地教會的未來關係，打開新的途徑；這是十分新穎的方向。讓我們再略舉一些例子。一位比利時魯汶大學的學生，正在撰寫比利時法拉芒語系的傳教士在中國的歷史。一群荷蘭籍的方濟各會士，正在編寫荷屬印尼、日本、巴西、巴基斯坦、印度及中國的傳教工作史。聖心會一位傳教士正在撰寫他的同會會士在印尼的歷史。荷蘭籍的 Heerlen 會修女計劃撰寫她們在中國的歷史。荷蘭籍奧斯定會的神父在籌劃整理他們過往在玻利維亞及印尼的歷史。其他國家的類似例子尚多不勝數。

為何傳教會突然間對他們的歷史記錄重視起來呢？毫無疑問，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有很多前任的傳教士目前依然在生，而他們對撰寫公正的歷史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不

過除此之外，尚有很多其他原因。西方國家的傳教會實在懷念他們過往與其他大陸及其他地方教會的接觸。他們明白到這些日子如何充實了他們的生命，亦深感目前溝通的不足。但要重新發展溝通的話，自我檢討是勢所難免的事。今日的神職人員在肯定過往傳教士的某些建樹之餘，也深信必須從往日的歷史中汲取教訓。

在這裡我想舉一個例子。我有一位學生，是來自菲律賓修生，目前正在撰寫博士論文，探討方濟各會士在該會的傳教風範。方濟各會在當地的歷史可以遠溯至十六世紀。我的學生發覺早期的西班牙籍傳教士有很深厚的神修修養，他們真正持守清貧，心懷謙卑，並學習當地人的語言和文化。但有兩件事情是引以為憾的，一是他們未能成功地吸納菲律賓人加入修會，另一是他們引發起民眾中回教徒(摩魯族人)與非回教徒團體的緊張關係。問題的原因是，方濟各會士是學院文化人士，忽略了一般文字以外的文化；也由於他們是西班牙籍，充滿了西班牙本土七百多年來，因基督徒與回教徒長期鬥爭所產生的反回教心理。僅在二十年前，方濟各會才在菲律賓設立獨立的會省。菲籍會士對這段往史持敬重的態度，但也抱著開放的態度作出批評。藉此，他們能夠找到自己的身份，同時亦能夠以全新有效的途徑，去服務當地教會。以上都是有效地研究傳教歷史以發展新開端的好例子。

另一個新的方向是，傳教歷史學以外的其他學者，也紛紛對教會歷史產生興趣。這在相當程度上與歐洲的移民研究有關。毫無疑問，自一四九二或一四九八年起，歐洲大陸的居民大量地向世界各地擴散。他們大量湧到北美洲、拉丁美洲、澳洲、南非、及太

平洋諸島。有些地方移入的人口較少，但也甚顯著，包括俄羅斯人到西伯利亞，英國人到印度、肯雅、津巴布韋及斯里蘭加，荷蘭人到印尼、蘇里南及斯里蘭加，比利時人到扎伊爾，德國人到納米比亞和坦桑尼亞，法國人到非洲各地。這些移民潮都是同一個模樣。與他們完全不同的是，大量的非洲人被遷移到美洲，他們卻是被迫去當奴隸。中國大陸也有大量移民散居世界各地。但白人的移民卻並不和平，他們充滿擴張心理、殖民主義、剝削及攫取。今日的學者都在探討這個沉痛的事實。這事給西方人留下痛苦的回憶，而他們也希望正視這份感受。不過，移民非但只是政治上的問題，教會在很多方面也牽涉其中。這就是學者對傳教士所扮演的角色感到興趣的理由。

這裡，我們仍舊只能指出一些進行中的工作。Urs Bitterli寫了他的《洪荒與文明：歐陸與海外的接觸》（慕尼黑1976年版）。他的另一本著作為《新舊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紀歐陸與海外接觸的形式》（慕尼黑1986年版）。這些都是出色的「心態研究」，剖析了很多擴張心理中潛伏的意識。為他們來說，見到世上在自己以外竟然另有宗教與文化，實在是天大的發現。而他們也用了很長的時間，才能夠令自己接納這些發現。

在德國，有很多學者正在研究基督宗教傳教士與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之間的關係。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德國汎起一股「德意志主義」的思潮，認為他們有一份獨特的歷史使命。無論天主教或基督教的傳教士，都是在這個時期成長的一代，結果怪異地結合了傳教熱忱與殖民主義。在這方面，有兩位值得一提的作者，H. Grunder寫了《

基督宗教傳教工作與德意志殖民主義：一八八四至一九一四年》（Paderborn 1982年版）；Klaus J. Bade 寫了《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主義：德意志帝國與殖民地帝國主義》（Wiesbaden 1984年版）。

至於荷蘭人，則不但視殖民地為經濟領域的擴張，更是文化及教育的輸出。傳教士在這方面有很大的參與，包括興辦學校、醫院及其他社會設施。至於這些機構是否能幫助當地人更有效地參與本身的歷史及文化，則是另一個問題。對這方面的問題，可見於H.L. Wesseling的《印第安的沒落：歐洲擴張主義下另一事實》（阿姆斯特丹1988年版）。Wesseling引述了Sir John Seeley 的說話：「我們似乎在完全漫不經意之間，一下子征服了半個世界。」法國人對他們的意識，也作了同樣的反省。Tzvetan Todorov 寫了《彼我之間，一個法國人對文化多元化的反省》（巴黎1989年版）。

另有兩部著作與我們的主題關係尤深。其中一部是T.O. Beidelman的《殖民地傳教學，向東非草根階層展開傳教工作的研究》（Bloomington 1982年版）；另一是《帝國主義時期傳教士的意識形態》（Arhus 1982年版，T. Christensen與 W.R. Hutchison 合編）。這些著作搜羅了大量的個案研究。但我們仍需要更多的個案研究，好能達致更全面的結論。不過，目前已清楚顯示出，傳教士在許多方面都涉及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者的活動。舉例說，法國傳教士往往有意無意地為法國在中國的半殖民地式橫行說好話，辯稱梵蒂岡的旗幟必須有法國的三色旗陪伴，才可以在中國通行，保教勢力不可或缺，而法國也是教會的長女。美國傳教士則常

以基督宗教文化作為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的道德代名詞。瑞典的傳教士則認為傳福音是現代化的必要條件。正視這些問題是一件好事。不過無須過份誇大，因為大部份傳教士都會為這些不太純正的動機而感到苦惱。只有在意識到這些問題之後，我們才可以確立與其他民族、文化及宗教的新關係。這些研究對我們來說，實在極具參攷的價值，有助我們得出正確的結論。新的傳教時代將與往日的截然不同，將以思想上的改變及悔罪作為開始。這種新方法也帶我們重返原來耶穌基督及祂的門徒的傳教理想中。

近代對傳教史研究所得的第三項新視野是，在過往傳教中，傳教士的動機一直在變。傳教士的動機是推動人們到遠方去宣揚福音的主要動力。這方面的研究，是為平衡上述的取向。A. Camps及J. Jongeneel經已開始了一些工作。在我們新近出版的《傳教學中的合一思想》一書中，我與J. Jongeneel寫了好幾篇文章，專注於傳教運動的內在動力，除了其他外在誘因之外，傳教運動本身如何成為一項運動，亦在討論範圍之內。我們發現傳教動機不斷在變。西班牙及葡萄牙保教權眼中的傳教使命，與傳信部眼中的傳教使命大不相同。而十七世紀法國出現的傳教會，又興起了新的神修思想及新的動力。十九世紀的傳教工作幾乎可以說是從零開始，幸得額我略十六世、庇護九世以及繼任的幾位教宗努力不懈，教會的傳教活動得以復興。令人感到詫異的是，第一屆梵蒂岡大公會議幾乎完全對傳教工作不聞不問，傳教問題似乎僅限於中東。一八七八至一九一四年間，教宗與傳教士之間發生過不少衝突，歷任教宗都意識到很多傳教士所忽略了的潛在危險。一九一四年以後，教宗嘗試與傳教士

一同迎接一個新的世界，一個非殖民化的世界。他們的做法，是強調建立本地神職及本地教會的重要性，並解除信仰與西方文化的必然關係。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十分重要。時至今日，仍有很多人不明白編寫本地教會史的意義。有些人仍舊只要求一個歷史事實的流水帳。以Leo Elders博士的著作為例，他評論上述有關傳教歷史的書籍時，就抱怨作者遺漏了大量關於傳教士的光榮事蹟。顯然，他並不明白作者們的用意。而David Bosch也有類似的問題，似乎他實在難以接受新的傳教歷史研究法。

無論如何，這個新的方向有助我們發現傳教運動的動力，並加強我們對上主臨在於各地教會內的信心。上主及聖神不斷注入新的方向及新的動力。人們可以說，歷史的主宰不斷地在歷史中的這一個時刻，帶引著祂的子民。在這份信念之下，信眾及教友領袖有勇氣繼續邁向天主的道路。

今天，地方教會歷史研究已愈來愈形重要。地方教會真實地存在，並努力爭取應有的權利。本地教會切願在普世教會內攜手合作，一如梵二所訓導的，組成一個普世教會。現在我們感受到教會的普世性與地方性之間出現緊張。這是一種健康的緊張關係，但這緊張關係所涉及的問題則必須予以解決。也許，對傳教歷史的研究，有助我們在各地的教會歷史中，看出這個緊張關係的問題。歷史是生活的指南，這為教會而言亦十分真實。過往很多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從錯誤中摸出道理來。但聖神的動力及主耶穌基督卻不會對教會袖手旁觀。歷史研究將令普世教會及各個地方教會生氣勃勃、充滿活力，深具創意。